

## 從傳統農業到現代農業 ——大陸農業的發展及問題

今天我提出來與大家交換意見的題目是：從傳統農業到現代農業，講的是大陸農業的發展及問題。剛才陳希煌教授講到大陸的「三農」問題（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非常地嚴重，胡錦濤總書記講過「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家都知道，在大陸，什麼事情提到重中之重，就說明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而且是不太好解決的。這種情況下，短短的二十五分鐘無法深入的探討很多問題，只能提出一些膚淺的建言和自己一些理解向大家彙報。

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的農業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現在來說，大陸的農業可以說正

在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在這一進程當中，農業的產業結構、從業人員的職業構成、農產品的進出口格局都相應發生變化，農村的組織與制度也在不斷變遷，政府對農業的政策也在適應形勢的變化而相應地調整。

第一個問題是，大陸農業的經濟形態正在從自給、半自給的小農經濟向市場化、商品化和貨幣化的經濟轉變。

在此有幾個指標：一個是用二十多年來，農用生產資料的使用程度、農民總收入中現金收入的比重、農民生活消費支出中現金支出的比重來衡量，可以說大陸農戶經濟的市場化、商品化和貨幣化的程度在不斷地提高。比如說二十多年來，農村的用電量從一九七八年到二〇〇三年增長了十二·五六倍。農用的化肥施用量從一九七八年到二〇〇三年增長了四倍；農用塑膠薄膜的使用量從一九九〇年到二〇〇三年增長了二·三倍。另外，農民總收入中現金收入的比重由一九九〇年的六八·三二%提高到二〇〇三年的八一·七七%。各位都知道，農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的收入不一樣，城市居民的收入都是現金收入，農民的收入中有實物性的收入和現金收入。比如說，農民收穫的稻稈、柴草，都要折合成收入，農民自己消費的糧食也都是收入，所以在過去，農民的現金收入比例是比較低的，只有不到七〇%，但是現在已經提高到八〇%多了，說明這方面貨幣化的程度比較高

了。另外一個是消費支出中，購買（現金支出）也是相應地提高到八〇%多。

還有一個反映大陸農戶經濟的市場化、商品化和貨幣化程度的很重要的指標是農產品的商品率。這個指標比較複雜，因為農產品有各種各樣的門類，所以不同產品的商品率不一樣，而且統計上也很難得到數字，但總的來講，農產品的商品率這二十多年來也是在不斷地提高。

第二個問題就是農業的產業結構正在發生變化。

一個是需求方面，首先是消費需求結構發生變化。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對於糧食的直接生產消費都減少，對食油、豬牛羊肉、家禽、蛋、奶、水產品的消費則是穩步增長。大陸農業的產業結構也相應發生變化，種植業在農業內部各業中雖仍佔有重要的位置，但產值份額大幅度下降，從一九七八年到二〇〇三年，種植業產值在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八〇%下降到五一·七%。

畜牧業和漁業成爲農業內部各業中發展最快的產業，是推動農業內部結構變動的主要力量。畜牧業的發展波動較大，漁業則比較穩定。從農、牧兩業結構變動的關係看，農、牧業的比例由一九七八年的八四·二：一五·八，轉變爲二〇〇三年的六〇·九：三九·一，農牧業結構趨向合理。種植業內部糧食作物、傳統經濟作物的比重下降，園藝作物的

比重相應上升，就糧食作物而言，稻穀和小麥的比重下降，玉米和大豆的比重上升。

第三個問題就是農村人口高度分化，亦即，從單一的職業構成向多元化的職業構成轉變。

現在界定大陸農民人數，主要是根據戶口同計，不管是稱農村人口或是農民，都只是一種身分，不再是過去理解的農民那一種同質性的集團。不是五十、六十、八十年前，孫中山先生所講的農民，那時候主要指的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現在的農民則是由異質性很強的不同群體所組成的複合體。現在的農民企業家有上百萬上千萬資產的，身分上來講是農民，然而貧困地區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也是農民，兩種不同身分的農民，際遇有著天壤之別。在這種情況下，不同地區農民的從業類型、收入水平有很大的差別，這種差別來自於所從事職業的不同和占有資源的數量與質量的差異。所以現在有主要從事農業的農業勞動者，也有從事二、三產業的勞動者、經營者，然後按照資產占有劃分，有僅僅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小農戶和擁有大量生產性資源的企業家。而且有很多的農民是新增的勞動力，因為現在大陸農村的土地制度提倡穩定農戶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如此一來，一些新增的農業勞動力甚至沒有賴以維生的土地資源。

一九九七年大陸進行第一次農業普查，普查的結果，大陸的農村住戶一共是二一三八

二：八萬戶，八七三七七·二萬人；當時的純農戶占了將近六〇%。農業兼業戶，（第一種兼業戶），以農業為主業的兼業戶占一八%多；非農兼業戶，（以農業為副業的第二種兼業戶），占十二·八%；非農戶占九·七%。所以當時的結論是，一九九六、九七年，農業純農戶和第一種兼業戶占了主導地位，將近八〇%。但是八年之後，目前農戶的構成有什麼樣的變化呢？我問過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司的司長，我問他：「現在大陸的農戶構成是怎麼樣的呢？」他說：「這個問題要明年之後才能回答你。」為什麼呢？因為今年開始，大陸要進行第二次的農業普查，到時才能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數字。但是我個人的判斷是，就大陸當前農戶的構成，在農村可能是大量的小規模兼業農戶和少數的專業大農戶並存的一個格局。我想台灣可能也是這麼一個走勢。我看亞洲包括日本或韓國恐怕也是這麼一個走勢。

今後的發展趨勢可能是小規模兼業農戶不斷地分化，一部分可能發展成專業農戶或者專業大農戶。一部分可能發展為，第一、一兼戶轉為二兼戶，進而成為完全的非農就業；另外，農村的八億多人口當中外出打工、在本地區之外，有比較穩定就業機會的農村勞動力已經將近一億一千萬人，這部份中的多數人已經從農村游離，而且基本上就在城市打工、兒就業。但是這一部分人又沒有被納入到城市的保障體系及就業體系，沒有享受到城

市的社會福利，所以這一部分人口成爲一種邊緣化的人群，也就是現在講的農民工，它實際上是三農問題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三農的問題還包括，農民工的拖欠工資問題、農民工的福利待遇問題、農民工的生活條件問題等等。但是關鍵問題就是這一部分人，實際上是處於城市和農村之間的一種邊緣性群體。是故面對農村人口高度分化的情況，現在的統計指標並不適應這種形式。因爲按照現在的統計指標，城鎮化比率已經從二〇〇〇年的三六·二%多上升到二〇〇三年的四〇·五三%。二〇〇四年大概要到四一%多。按照這個比例指標的話，農村人口已經降到了六〇%，大約是五九%、五八%多，但是農業就業比率幾年來一直保持五〇%。這個指標實際上是有問題的。

原因是出在城鎮化比率是城鎮人口和總人口的比率。但是現在的城鎮化比率、城鎮人口是按照人口普查的統計口徑，是凡是在所在地生活六個月以上的，就登記爲當地的人口。所以在北京建築工地蓋樓的工人，蓋了六個月以上的就算是北京的城市人口。但是這部分人實際上是農民，他們在農村還有地，所以也沒有享受到城市公共財政負擔的福利。從統計口徑，一九九九年城市化比率是二一%，到二〇〇〇年人口普查城市化比率是二六%，比率發生這麼大的變化，原因就是統計口徑改變了。

所以提到農業就業比例是五〇%，農業就業比例是農業就業人數和總就業人數的比

率。但農業就業人數有多少？按照現在來講，農村的勞動力大概有四億八千萬，去掉一億二千萬，稱之鄉鎮企業勞動力。餘下的三億五千萬稱做農業勞動力。這三億五千萬裡邊有一億多，將近二億是剩餘勞動力，但是三億多裡邊又包括了一部分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他們算在農業勞動力裡邊但同時又算在城市的人口裡邊，他們創造的貢獻算在城市(SDG)裡邊，但卻不能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社會福利，同時他們的收入又算在農民的人均持有收入中。在人均持有收入中，工資性勞動報酬收入占了將近三分之一。當我問統計局的有關人員，爲什麼這部分人的收入要算在農民的收入？他們說，因爲這部分人是戶主（戶裡的主要勞動力），如果不算入戶主收入，那農民的收入就更低了。

此外，鄉鎮企業的勞動力，根據統計，一九九七年，大陸的鄉鎮企業（TVE）有二〇一五萬個，從業人員一三〇〇〇萬人；但按照統計口徑，所說的鄉鎮企業等於是擺個煙攤也算是鄉鎮企業，上千個人的工廠也是鄉鎮企業，它包括工業、商業、建築、服務運輸業，包括個體私營、包括集體所有制企業、也包括合夥企業。一些股份制企業，甚至大的股份公司有的也是鄉鎮企業。大陸第一次農業普查對非農鄉鎮企業的調查物件規定爲：

- 一、領取企業法人執照的各類企業；
- 二、未領取企業法人執照、但滿足以下四條標準的鄉鎮辦、村辦、村民小組辦和聯戶辦的非農生產經營單位：

- （一）有固定的生產經營組織、

場所、設備和從事經營活動的人員；（二）常年從事經營活動，季節性生產經營活動全年開工時間在三個月以上；（三）有獨立核算制度和帳目；（四）有當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頒發的營業執照。三、雖領取的是農村個體工商營業執照，但雇工八人以上（含八人）。按大陸第一次農普的標準，一九九六年末，非農鄉鎮企業一三九·七二萬個，從業人員五九九·五五萬人，也就是說，鄉鎮企業從業人員中有七〇〇〇多萬是臨時性、季節性和不穩定的非農就業人員。所以所說的農業勞動力的統計數字有的部分可能多算，有的一部分可能少算，真正的農業勞動力有多少，實在不得而知。不過，我覺得一成不變地說占五〇%的數字是不準確的。

第四個問題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農產品的供給與需求結構從封閉向開放轉變。二〇〇四年大陸農產品進出口總額已經達到五一四·二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了二七·四%。出口額是二三三·九億美元，進口額是二八〇·三億美元。所以進出口貿易差額是由上一年的順差二五億美元轉為逆差四六·四億美元。也就是說，從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大陸的農產品貿易頭一次出現了逆差。但是，出口額和進口額確是連續第五年增長，創造了歷史的新紀錄。大陸的農產品進出口總額已經突破了五〇〇億美元大關，可以說已經跨入了世界農產品貿易大國的行列。將歐盟國家做為一個統一體，大陸列世界第四位；



按國別排列，大陸列世界第八位。所以，出口的品種由低層次、少品種向加工品、多樣化發展，蔬菜、水果、水產品的出口增長較快。園藝業、漁業也有相當的發展。進口方面也不斷擴大，二〇〇三年的進口額為一八九·三億美元（不包括水產品進口額），年增長率達到五二%，蔬菜、鮮果的進口量分別為一〇·七萬噸和一〇六·二萬噸，金額是〇·八億美元和四億美元左右。根據海關的數字，從台灣進口的水果大概只有價值二三〇多萬美元，有人問，如果開放台灣農產品進入大陸，對大陸農業會不會產生衝擊？從這個數額來說是很小的，即使翻幾番，大陸整個市場也完全能夠容納。

第五個問題：改革開放以來農村不斷進行制度變遷與組織創新。

在農村的土地制度變革上最主要的關鍵問題——是土地問題。農民對土地承包經營權，逐漸演變成爲一種財產權。二〇〇二年發布了農村土地承包法，提到耕地的承包期是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三十年至七十年；這個法條的二十六條規定承包期內，發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二十七條規定承包期內，發包方不得調整承包地。不過這些法條只規定了農村內部的問題，如果農地被轉換成非農用地，被用於工業或商業用途，這一部分農民的補償問題，法條並沒有涉及到。所以二〇〇四年一月，國務院有一個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二〇〇四年二八號文件），有一部分談

了完善徵地的補償和安置制度，這是保護農民對農地的使用權和農地被徵用時，保護失地農民的權益，是農村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也就是說，第一，有地的農民和失地的農民同樣要有生存權。第二，農民要有發展權。但是，我比較憂心的是農村的土地問題。目前在大陸還是一個非常尖銳的矛盾，所有這些法律、條文一旦跟地方政府、企業的利益比起來還是處於不利地位。

爲什麼說宏觀調控有時候很難到位？爲什麼關於清理開發區等問題受到地方政府各方面各種形式的抵抗？因爲很多做法是要把農民的地以低價買下，然後吸引FDI，吸引招商引資，提高GDP，財稅收入、政績等等，然後增加稅收，然後政府和企業再來分享土地增值的利潤。所以這是一個利益問題，中央的各種法律也好、文件也好，碰到利益衝突，往往解決起來難度很大。

要使農民生產的產品能順利地進入市場，要使農民能夠分享或者獲取初級產品進入二三產業後的增值利潤，在大陸農村叫做發育新的組織載體或者契約方式，是農村經濟組織創新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所以無論是農民經紀人還是一些專業技術協會，如果只是牽線搭橋、聯繫買賣、提取手續費，很難把業務做大、做強。所以要提升農產品市場競爭力、佔領市場份額，就要打出品牌，制訂和實施與國際接軌的質量標準，對初級農產品進行粗加

工、精加工，即劉遵義校長講的 quality assurance，一系列的包括質量檢測，包括認定的一些問題，這是目前一家一戶、中介功能的專業技術協會很難做到的部分，必須由經濟實體型的專業合作社或者公司來承擔。

我非常同意陳希煌教授所講的，企業化經營往往是和農民無關的。要發展經濟實體型的專業合作社組織，我舉一個柑橘安全優質生產模式的例子。商標擁有者是一個柑橘合作社的副社長，公司的商標「忘不了」是一九八九年花了五千塊註冊的，註冊之後，雖然副社長本人是運銷大戶，但是公司的柑橘營銷量佔據市場的份額太小，商標起不了作用。合作社成立後，他便把商標轉讓給合作社，合作社以「忘不了」商標打到上海博覽會，打的廣告詞是：「不吃不知道，一吃忘不了」。結果竟然打開了上海市場。

另外一個例子，是楊梅專業合作社。楊梅最大的問題是保鮮問題，保鮮如果實現不了，楊梅是很難有市場的，怎麼辦？一家一戶的楊梅農民於是組織合作社。合作社收購了楊梅之後，篩選、包裝、抽真空、加冰塊、封塑、最後冷庫儲運、銷售。如此一來，三天之後到香港，到任何地方都沒有問題。之前到北京收到了楊梅之後，打開一看，仍是新鮮的楊梅，一個個比乒乓球還大，非常好吃。運用同樣的方式，組建「大紅袍」枇杷的合作社，統一標準培訓、標準化生產。枇杷三十個、四十個小包裝給賓館飯店作為禮物

饋贈親友。另外西蘭花產業合作社本身的架構也比較完整，裡邊有一八二戶農民、十二個加工企業組合成的合作社每年從農民那裡收購六百萬多朵西蘭花，然後從非社員那裏收購二百多萬多朵西蘭花，八百多萬朵西蘭花銷售到日本去。質量問題非常重要，只要出一點問題，就會影響全體社員。比方三個社員違規，有的沒有使用規定的農藥，有的沒有在指定的地點購買農用生產資料，結果這三個社員被除名。

第六個問題、政府對農業的政策相應調整。隨著經濟與社會的變化，政府對農業的政策也在不斷調整，這種調整又與決策層對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觀的重新審視密切相關。

一、時期以來解決農產品的短缺問題、保障農產品的有效供給和增加農民的收入是政策關注的兩個重點。

二、進入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農產品短缺的問題解決，進入總量基本平衡、豐年有餘的階段，提出要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的調整，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成爲突出問題，也成爲政策的首要關注點。

三、二〇〇二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糧食生產滑坡，農村的基礎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的發展滯後等問題引起了廣泛關注，農

業、農村、農民問題成爲全黨和全國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〇〇五年一號文件就提出了：要「切實把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放在國民經濟全局中統籌安排，更加自覺地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更加主動地加強農業基礎地位」。但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就是落實政策，因爲對策再多，若無法確實執行問題，恐怕也很難解決。

最後一個問題，大陸和台灣的農業合作前景廣闊。

兩岸之間目前還沒有實現直接貿易，許多台灣優勢農產品的貿易優勢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台灣的水產品、熱帶水果、花卉、有機蔬菜和種子種苗等優勢農產品在大陸有巨大的市場空間。

台灣的農會、漁會、農民合作社、農田水利會及專業農畜協會、農民組織，在保障農民權益、發展農村經濟方面有許多經驗是值得學習、值得借鏡的。但是還是有一些政治問題必須先克服。將台灣在農業產業組織和營銷模式方面的資源和經驗與大陸豐富的農業資源條件、生產條件和市場條件相結合，必將有力地推動兩岸農業的發展。

實際上，最後我想說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二十多年來，大陸的改革是從農村改革開始。一九七八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提出關於農業改革的政策，然後一九七九年

中共中央有一個關於促進農村發展的決定，裡邊有兩句話就講到，對於農民要切實保障其物質利益，要切實尊重民主權利。如果沒有一定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任何階級的任何積極性是調動不起來的。我想二十多年來的實踐證明了這二句話。因此現在大陸農業、農村要發展的話，還是要強調，經濟上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政治上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要改善農村的治理結構。這方面跟台灣還是有很多方面可以合作、可以相互學習。陳希煌先生說中華民族是優秀的民族，台灣人是優秀的，大陸人也是優秀的，兩岸的農民在這個角度可以聯合起來，共同發展，來賺世界的錢。

